

21)

177-182

历史上人类活动对滦河下游  
河道变迁的影响

TV 147

唐亦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710062, 西安; 37岁, 女, 副教授)

**A 摘要** 以滦河流域的人口变化为经, 以土地垦辟和天然植被的变化为纬,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人类活动对滦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得出了滦河下游在历史时期的变化与其上、中、下游人类活动的规模和程度密切相关的结论。

**关键词** 人类活动; 滦河流域; 历史时期

**分类号** K916

河道变迁

滦河发源于河北丰宁县巴延图古尔山麓, 称闪电河, 沿途先后有小滦河、兴州河、伊逊河、武烈河、瀑河等数条支流汇入。与小滦河汇合后, 始称滦河。其中游迂回于燕山山地。滦县以南的下游平原流程较短, 最后在河北省乐亭县王庄乡流入渤海。滦河全长 888 km, 其流域地跨北纬  $39^{\circ}10' \sim 42^{\circ}30'$ , 东经  $115^{\circ}31' \sim 119^{\circ}15'$ , 在河北省境内的流域面积约为 44 900 km<sup>2</sup>。

历史时期以来, 滦河流域经历了人类活动的影响, 使其下游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和阶段性。本文主要以滦河流域的人口变迁为经, 以其土地垦辟和天然植被的变化为纬, 将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对滦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影响分阶段论述之。

## 1 唐及以前时期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 滦河上游沿岸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如在承德岔沟门出土的簸箕形石锄、打制石斧、石铲、篦纹平底瓮等都接近于富河沟门类型文化<sup>[1]</sup>。

与中原商周文化时代相近, 滦河上游的承德伊犁庙台地、平泉化营子、沟门子<sup>[2]</sup>、黑山口、隆化于家沟等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这一地区亦有数处分布。

秦、汉时期滦河上游地区的人类活动继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1976年, 在围场县大兴永东台子和小锥山城址先后发现刻有秦始皇 26 年(公元前 235 年) 诏文的铁权 3 件。在秦权出土的城址中, 还有各种秦代瓦当、板瓦、筒瓦及兽骨等, 城址周围并分布着同期墓葬。

上述事实表明, 自新石器时代以来, 滦河上游地区人类活动就对这一地区的环境产生着影响。不过根据上游承德地区最早的郡县级地名的出现晚至北魏时来看, 可知至少在北魏前, 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规模还是较为有限和微弱的。隋、唐时, 滦河上游地区分别为奚部和唐饶乐都督府所辖, 在这一地区内均未有郡县设置, 表明此时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程度还局限在较为弱小的水平上。

滦河中下游地区人类活动出现的时间较上游地区为早, 可远溯至旧石器时代。

与商周时期相近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在滦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有卢龙东国各庄、滦南东庄店<sup>[3]</sup>和唐山古冶遗址<sup>[4]</sup>。卢龙的东国各庄属商孤竹国范围, 曾出土过商代晚期饕餮纹铜鼎、乳钉纹簋等。此外,

在卢龙北青龙等地还出土了商代青铜器等。

为能更清楚地说明问题起见,将秦至唐时期滦河中下游地区的人类活动状况与滦河变迁状况列出一览表如下:

表 1 秦至唐代滦河中下游河道变迁与人类活动状况一览表

Tab. 1 Human Activities and the Channel Evolution in Middle and Down Reaches of Luan-he River from the Qin Dynasty to the Tany Dynasty

朝代	年代(公元)	滦河入海处	人口数(万人)	每口平均土地面积	领县数(个)
秦	前 221~前 207				1
西汉	前 206~公元 8	滦南柏各庄一带	7.549 8	13.88 亩(约合今 0.65 hm <sup>2</sup> )	3
东汉	公元 25~220	滦南柏各庄一带	4.898 7	14.57 亩(约合今 0.68 hm <sup>2</sup> )	3
西晋	265~317	滦南柏各庄一带	0.186 7		2
北魏	386~534	滦南柏各庄一带			3
东魏	534~550	滦南柏各庄一带	0.374 1		5
隋	589~618	滦南柏各庄一带	1.134 5		1
唐	618~907	滦南柏各庄一带	2.508 6	27.03 亩(约合今 1.62 hm <sup>2</sup> )	2

注:表内滦河入海处一栏据《唐山市水利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人口数据各正史地理志得出;每口平均土地面积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领县数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和各正史地理志;各朝人口数和每口平均土地面积均为其中后期统计数。

滦河隋唐以前称濡水。秦时,曾沿北部及东北部长城沿线设有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 4 郡。滦河中下游地区在秦属辽西郡的范围。秦县因年久渐湮,难以确考。

从两汉至唐,滦河中下游地区的开发始终在进行过程中,但其开发的强度并不与时代的先后成正比,这从历代人口的发展状况可清楚地看出。如表 1 所示,西汉时,在滦河中下游地区,由于灌溉条件便利,利于农业发展,故人口增加也较为迅速。如当时西汉在滦河中下游设立的 3 县中,每县平均有 25 166 人,总人口达 70 000 余人,东汉时这一地区的行政建置一如西汉,但 3 县的总人口降至 50 000 左右,每县平均 16 329 人。至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及战乱,人口下降的趋势也较为明显。如西晋时滦河沿岸 2 县的人口总和还不足 2 000 人,东魏时 5 县的总人口只有 3 700 余人,平均每县只有 700 余人。至隋时,这一地区的人口逐渐回升,卢龙一县的人口就有 2 269 户,11 345 人。但直至唐全盛期的天宝年间,唐北平郡的卢龙、石城、马城 3 县的总人口也只有 25 086 人,始终未恢复到西汉时的水平。

与人口变化相对应的是各代垦辟土地的数量与规模。如表 1 所示,从西汉至唐,这一地区的人均平均土地面积渐次上升,至唐天宝时达到 27 亩多(约合今 1.62 hm<sup>2</sup>)。这一现象说明,在生产水平基本维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人口不断增加从而超过了一定限度使得与人均土地的拥有量成反比。

人口的增减和土地的垦辟程度也直接影响到森林植被的变化。滦河中下游地区在中全新世时,其孢粉组合反映为阔叶林为主的森林草原景观,栎属占明显优势并为主要的建群树种。晚全新世时为森林草原植被景观<sup>[6]</sup>。但秦汉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及土地开垦程度的不断提高,天然植被不同程度地为栽培植被所代替。以表 1 中每口平均土地面积计之,则西汉时,这一地区垦辟的土地约有 1 047 912 亩(约合今 48 902.56hm<sup>2</sup>);东汉时有 713 741 亩(约合今 33 307.91 hm<sup>2</sup>);唐代有 452 292 亩(约合今 27 137.52 hm<sup>2</sup>)。由此看来,人口与土地的垦辟成正比。即人口数愈高,土地开垦的数量就愈多。同时也说明人口数量、土地的开垦和天然植被三者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影响。

这一时期中,滦河入海口一直约在滦南柏各庄一带。这是由于这一时期中,人类活动的影响大多局限于中下游地区,而在上游地区还较为微弱,使得下游河流的泥沙含量也较为有限(详见结论部分)。另一方面,由于西汉至唐时渤海湾大海侵的影响,使得下游河程较短,河流挟带的泥沙较易畅流入海,不易形成淤塞,故对下游河道的影响也较小。

## 2 辽、金时期

辽时在此设置了中京道,辖有大定府、北安州、泽州、高州等府州。辽时中京道的人口数字除高州外,其他各州均缺载。但据高州三韩县有户数 5 000 估计,当时位于滦河上游地区的 3 县(兴化、神山、滦河)的户数也约有 15 000 户。若以每户 5 口计,则 3 县共有 75 000 人。金时,改辽中京道为北京路。金泰和四年(公元 1204 年)以前,这一地区有神山、滦阳和兴化 3 县(滦阳泰和四年(公元 1204 年)罢;又将兴州所领之兴化县白槽镇在泰和四年(公元 1204 年)升为县,仍隶兴州,故金时这一地区仍为 3 县)。3 县的人口若以口户比 5:1 计之,则金泰和四年(公元 1204 年)后共有人口:(15 970+4 927)×5=104 485 人)<sup>①</sup>。

总之,辽、金时期,是滦河上游地区的行政建置渐趋完善和人口迅速增加的时期。至金代以后,这一地区的人口已超过了西汉时的人口规模,如表 2 所示。

表 2 辽、金时期滦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和行政设置一览表

Tab. 2 The Pop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 in the Region of Middle and Downreaches of Luan-he River in the Jin Dynasty and the Liao Dynasty

朝代	年代(公元)	人口数(万人)	领县数(个)	滦河入海口
辽	947~1 125	12.5	6	滦南柏各庄
金	1 125~1 234	55.777	8	昌黎团林一带

注:表内领县数一栏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人口数一栏分别据《辽史·地理志》和《金史·地理志》所载之人户数,按口户比 5:1 估算得出,入海处据《唐山市水利志》。

辽时,今北京地区为陪都,并设立南京道,滦河中下游的平州即为其所辖。唐以前这一地区的行政建置基本上不超过 3 县(详见表 1。只有东魏达到了 5 县。但人口却极为稀少,总共不足 4 000 人,与其建置的密度并不吻合),至辽时达到 6 县,人口有 12 万余人,金时,北京地区为国都,金在滦河中下游地区设县已达 8 个,人口竟达 55 万余人,远逾以前各代,达到了金以前这一地区历代人口的高峰。

这一时期滦河流域虽因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得土地和天然植被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而且由于附近中都地区都城宫阙、房屋街道的兴建,大量人口所需的燃料及军事设施的建造等使得这种趋势日渐明显。但总的来说,辽、金时期这一地区人类活动的规模还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金盛时的世宗、章宗而论,金世宗在位 29 年,史书明确记载的“猎于近郊”的次数就达 11 次<sup>②</sup>,平均每 2.5 年就有一次。金章宗在位的 20 年中,猎于近郊的记载几达 20 次<sup>③</sup>,平均每年一次。这说明至少在金时,京师及周围地区的天然植被尚有相当的规模,使得帝王出游时有猎可狩,无需远涉,近畿地区的天然植被状况尚且如此,较之偏僻的地区或深山中的天然植被的保存状况就可想而知了。辽、金时滦河中下游天然植被的破坏虽未大规模进行,但由于其人口增长速度十分惊人,相应地人类活动的规模增加,垦辟土地日多,使得河流中的泥沙含量不断增加,终使滦河的入海处从金中期前滦南柏各庄一带移至昌黎团林。

## 3 元代

这一时期中滦河流域人类活动的特点表现为叠加于人口变化之上的上、中游地区森林的破坏和中下游地区大规模屯田的进行。

元时,滦河上游地区设有开平县、桓州、兴州、宜兴州等均属上都路所辖。其中,桓州不领县,宜兴州

① 《金史》卷 24《地理志》5,北京:中华书局,1975. 550~578

② 《金史》卷 6~卷 8《世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 121~207

③ 《金史》卷 9~卷 12《章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 207~289

原为兴州宜兴县。上都路在元中统初曾为开平府,至中统五年(1265年),才以“(世祖)阙庭所在,加号上都”<sup>①</sup>,4州县共约有人口2万余人<sup>②</sup>。

滦河中下游地区为永平路所辖。至元七年左右(1270年左右),永平路有户13 519,口35 300人。到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永平路有7,6773人<sup>③</sup>。从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21年间,永平路的人口增长率为5.59% $[r = \frac{1}{t}(\frac{P_s}{P_0} - 1)]$ 。按此增长率计算,这一地区和元泰定末年(公元1327年),其人口增至235 847人 $[P_{1327} = P_0(Hrt^t)]$ 。

元代对于这一地区土地的开垦也空前活跃,军、民屯大兴。当时,“内则枢密院各卫,皆随营地立屯,军食悉仰足焉。外则行省州郡,亦以便利置屯”<sup>④</sup>,如在滦河下游地区,元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在滦州设立了永平屯田总管府,属大司农司统辖。该总管府曾辖有屯民3 000余户,先后屯垦土地1 161 449亩(约合今69 687 hm<sup>2</sup>)<sup>⑤</sup>,这些土地多为新垦荒地,则屯垦时原有的天然植被基本上已被破坏无遗了。元代除国家设立各类屯田机构外,地方州县的屯田也十分盛行。土地的过量开垦导致了滦河流域森林植被的大量破坏,从而使元时滦河的洪涝灾害也较前代为剧。据文献记载,有元以来的80余年中,滦河较为严重的河泛就有10余次<sup>⑥</sup>,平均每7~8年1次,且多“飘没官民庐舍殆尽,溺死人畜甚众”<sup>⑦</sup>。

## 4 明 代

明政府在滦河上游未设置郡县,只有一些军事驻防机构,均为后军都督府管辖。计有开平左屯卫、中屯卫、兴州5卫、东胜左卫、宜兴守御千户所、宽河守御千户所等,共有卫、所驻防兵约50 000余人。

滦河中下游地区承元之旧,亦曾大兴屯田。如洪武末至永乐时,为了发展经济,进而起到拱卫、充实京师的目的,在顺天府和滦河中下游地区的永平府陆续迁入的军、民屯户口就达50多万。明中期的弘治—隆庆时期是这一地区经济不断发展、人口持续增加的时期。至万历时,人口达到全盛,位于滦河中下游地区的永平府的人口约有255 646人(万历六年,1578年)。

与人口增加相对应的是每口平均土地开垦面积的变化。以万历时全国每口平均土地面积7.17亩(约合今0.437 hm<sup>2</sup>)与唐代相较,前者只占后者的 $\frac{1}{4}$ 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占有土地的亩数则愈来愈少。

与此同时,位于滦河中游地区燕山山地的森林在明时遭到较为严重的破坏。当时京畿地区所需之木材、薪炭多仰仗西山、燕山森林。但因明代这里山地森林的大量破坏,加速了滦河下游河道的变化。据记载,明代滦河决泛较严重的约有13次,给沿岸地区造成“平地水深丈余”,坏田庐,损禾稼的严重后果。

这一时期,滦河下游入海口也曾变易,明前期入海口一改元时从昌黎团林一带入海而在乐亭北分为东、西二支分别入海。

## 5 清 代

清代是滦河上游地区进入全面开发的时期。清康熙时,为木兰秋狝的需要,在滦河上游承德地区划定了木兰围场,以后又沿秋狝路线先后设立了大小20余座行宫及避暑山庄。随着这一地区政治地位的提高,其行政建置规模也得到了不断升级和扩大。雍正元年,(公元1710年),清廷在此设立热河厅;雍正

① 《元史》卷58《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1 345~1 383

② 据《元史》卷58《地理志》所载户口数估算得出

③ 《元史》卷100《兵志·屯田》;北京:中华书局,1976.2 558~2 564

④ 据《元史·河渠志》、《元史·五行志》等统计得出。北京:中华书局,1976.1 587~1 614;1 049~1 093

⑤ 康熙《卢龙县志》卷二

⑥ 《明史》卷90《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2 193~2 235

十一年(公元 1721 年)改设承德州;乾隆四十三年(公元 1779 年)改为承德府;嘉庆十五年(公元 1811 年)设热河都统府<sup>①</sup>。与此同时,许多来自山西、山东和邻近地区的移民也大量涌入承德附近。他们大部分是为皇庄和旗兵种田,也有一些人充作匠役和兵丁。与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是对土地的开垦和对周围森林植被破坏的进一步加剧。乾隆年间在围场部分地区已开始大规模砍伐森林,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嘉庆时。森林的大规模破坏又直接导致了滦河洪泛次数的增多。据统计乾隆、嘉庆时承德地区滦河的洪涝灾害分别为 18 次和 25 次<sup>②</sup>,反映了植被破坏与河患增加的同步现象。例如从乾、嘉时期的局部破坏到道、咸时期的局部恢复,再到同、光开围后的全面破坏,相应地该地区滦河灾害的次数也经历了增加→减少→增加的过程。

清时滦河中下游为永平府所辖。嘉庆末(1820 年)人口已达 670 849 人<sup>[7]</sup>,时永平府有地 2 417 350 亩(约合今 145 041 hm<sup>2</sup>)<sup>[8]</sup>,平均每口仅有田 3.6 亩(合今 0.216 hm<sup>2</sup>),与以前历代差距甚大,不可同日而语。随着人口迅速增加,人均土地面积愈来愈少,森林破坏愈加严重,河患的增加也愈趋明显。

这一时期中,滦河中下游地区河患的发生一方面受本地区森林和土地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上游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对其河流状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现将乾隆至光绪年间滦河中下游地区各县的灾害统计表列于下:

表 3 清乾隆至光绪年间滦河中下游地区灾害统计表

Tab. 3 Statistics on the Disaster in the Region of Middle and Down Reaches of Luan-he River in the Ching Dynasy of Qian-long and Guang-xu Period

州县名/灾害次数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合计
	1736~1795	1796~1820	1821~1850	1851~1861	1862~1874	1875~1908	
迁安	2 (20%)	1 (10%)	0	0	0	7 (70%)	10
卢龙	6 (16%)	4 (17.4%)	5 (21.74%)	0	0	8 (34.8%)	23
滦州	8 (23.5%)	7 (20.6%)	3 (8.8%)	0	2 (5.9%)	14 (41.2%)	34
乐亭	12 (36.4%)	6 (18.2%)	3 (9%)	0	1 (3%)	11 (33%)	33
昌黎	6 (26.1%)	5 (21.7%)	3 (13%)	0	0	9 (39%)	23
抚宁	3 (23%)	3 (23%)	3 (23%)	0	0	4 (30.8%)	13
临榆	0	2 (28.6%)	3 (42.8%)	0	0	2 (28.6%)	7
合计	37	28	20	0	3	55	143

注:上表中,灾情按每年一次计;各栏括号内的百分数为相应年代灾害频率;据《清代海河、滦河洪涝档案史料》分析、整理。

从上表可看出:①洪涝灾害最严重的是光绪年间,其灾害频率最高竟达 41.2%(滦州),各州县全部超过 20%;其次为乾隆时期,灾害频率最高达 36.4%(乐亭),超过 20%的有 5 县 1 州;再次为嘉庆时期,灾害频率最高为 28.6%(临榆),超过 20%的有 4 县。这表明灾害频率的大小与上游乾、嘉时期的植被局部破坏和同、光时的全面开围期相吻合;②道光、咸丰、同治时滦河中下游 1 州 6 县的洪涝灾害较少(如表 3),反映了上游地区在清道光、咸丰间的休养生息阶段对下游河流状况的影响;③上游地区森林的破坏和土地的开发对下游河流状况的影响有一个滞后过程。如上游围场开围于同治时,而河患却在其后的

① 《明史》卷 406 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881~937

② 赵中枢:《承德地区城镇体系的形成与环境变迁的历史地理透视》,博士论文,1993,5

光绪时达到最大;①清代各期滦河中下游洪涝灾害次数最多的地区为:乾隆时乐亭,嘉庆时临榆,光绪时滦州,可看出位于滦河下游的滦州(今滦县)以南的下游河段是洪涝灾害的频发区域。光绪初年之前,其入海口经乐亭、汤家河、聂庄,于董庄一带入海。至清末时,入海口又在滦县、马城、汀流河、新集、会里、茹荷、姜各庄—莲花池一带来回摆动<sup>[4]</sup>。

综上所述,历史时期以来,滦河上、中、下游各河段经历了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些影响相互作用和迭加的结果,使得滦河下游在这一时期的变化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和阶段性。

滦河上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已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至辽、金以后,随着这一地区人口的增加和政治地位的提高,行政建置的发展和扩大,人类活动的作用也愈来愈明显,直至清康熙时,在上游承德地区划定了木兰围场,并先后设立了大小 20 多座行宫和避暑山庄。其后的乾隆时期在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对于土地的开垦和天然植被的破坏日益加剧,使得上游地区人类活动的作用对滦河河流状况的影响日渐重要。这种影响到清末的同治、光绪时由于上游全面开围期的到来而达到最大。

滦河中游流经燕山山地,辽、金时,虽亦时有人类活动对燕山地区自然生境破坏的记载,但其大规模的破坏至元代以后才愈演愈烈。

滦河下游地区自有人类出现以来,就一直处于不断的开发过程中。人类活动的影响无论就其持久性还是就其强度来说,都较上、中游剧烈。虽则如此,滦河灾害次数的增加与其上、中游自然环境状况的关系较下游地区密切。如上、中游地区的人类活动都是在辽、金以后日益加剧,至清末最为严重。而滦河的洪涝灾害也是自辽、金时起日益增多,至清末达到顶峰。因此,就滦河下游的河道变化来说,其根源在上、中游自然环境的改变而表现形式为下游河泛、改道的加剧。

### 参 考 文 献

-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北承德地区的古文化遗址调查. 考古, 1962(12): 641~643
- 2 郑绍宗. 有关河北长城区域原始文化类型的讨论. 考古, 1962(12): 658~670
-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河北卢龙县东阁各庄遗址调查. 考古, 1985(11): 980~984
- 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唐山市古冶商代遗址. 考古, 1984(9): 769~778
- 5 陈望和. 河北第四纪地质. 北京: 地质出版社, 1987
- 6 赵文林, 谢淑君. 中国人口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 7 唐亦功. 京津唐环境变迁.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8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4~547

责任编辑 徐象平

##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volution of Luanhe River in History

Tang Yigo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aanxi Teachers University, 710061, Xi'an)

**Abstract** The population change in Luanhe river basin was thought a main factor, ground exploited and primate forests destroyed was a secondary factor. The human activities, in the area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on the Luanhe river basin were studied. It showed that the change of Luanhe river basin in the historical period was the result of affect together with human activites in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Key words** human activity; Luanhe river basin; historical period